

红旗勋章：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枚勋章

■姜廷玉

勋章，是国家、军队授予有功人员的荣誉证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颁发勋章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给方志敏、徐向前因分别在赣东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反“围剿”斗争，未能到会，后来被授予红旗勋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荣誉——红旗勋章



随着全国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到会代表600余人，中央苏区和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赣东北、琼崖等苏区都派代表出席会议，红1、红3军团，红2、红6、红16军及各独立师均派代表出席，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也有代表到会。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做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战员。

红旗勋章基本形状为五角星，中间为红旗，红旗上有党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几个大字，红旗的四周是由齿轮与麦穗组成的圆，圆中间有一支枪，寓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人民大众的政权。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等人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革命战争

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授予红旗勋章。方志敏、徐向前因分别在赣东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反“围剿”斗争，未能到会，后来被授予红旗勋章。

方志敏于授勋16个月 后收到红旗勋章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赣东北省（后改称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因工作忙未能参会。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一枚。11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信方志敏：

方志敏同志：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战士锦旗一面，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

方志敏，赣东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恢复中共赣东北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建立农民革命团，召开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5县中共党员会议，成立中共5县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28年1月，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率部在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四次“进剿”，并在信江流域创建了赣东北苏区。1930年，领导组建了工农红军第10军。1931年3月，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任红10军代理政治委员。

因战事紧张，联络不便，直到1933年3月，时隔16个月，方志敏才收到中央政府的信和红旗勋章。

1933年3月18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葛源召开。方志敏向大会作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发来贺电，并派出中央苏区代表参观团、中央红军参观团前来参加大会。代表大会选举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3月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举行了授勋仪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派刘畴西带来了

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的勋章和给红10军的锦旗。刘畴西在会上宣读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方志敏的信，并将红旗勋章佩戴在方志敏胸前。

方志敏佩戴着红旗勋章，十分激动。会议代表们热烈鼓掌，许多代表激动得流出了晶莹的泪珠。人们回想起从土地革命以来的6年多时间里，方志敏和他的战友为开创闽浙赣苏区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历经多少艰难曲折，倾注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啊！闽浙赣人民由衷地崇敬他，爱戴他。代表们认为他无愧于这种褒奖，并衷心为他庆贺。

但方志敏却不自矜有功，他将一切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他在授勋仪式上致答谢词：

“同志们！闽浙赣苏区90万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决不动摇的斗争，结果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很大一片的苏区。这一苏区在全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已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而且已成为粉碎敌人举进攻，争取更大胜利，以至全国胜利的一个有力的苏区。这一苏区的创造，很明显的是由于全省工农群众与全体红色战士艰苦奋斗与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尤其是自1931年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有力的领导结果。

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斗争。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地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我更要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努力工作，尤其是对这次大会决议要特别尽力执行，并号召广大工农群众一致武装起来，粉碎敌人举进攻，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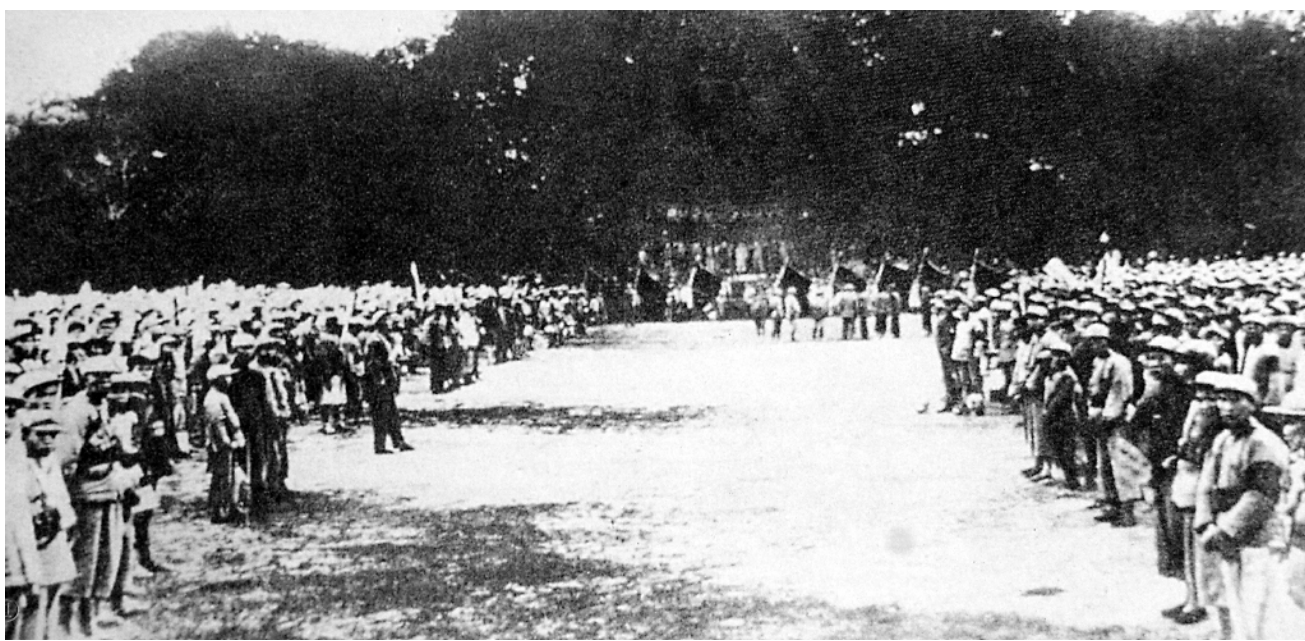
毛泽东长征途中为徐向前授勋

为了策应和迎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入四川，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挥所部渡过嘉陵江，随后开始长征。

1935年5月下旬，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一线走向川北。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其他领导人即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500米高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6月12日，徐向前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信。信中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以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为确保万无一失，徐向前亲自交代警卫员带一个班战士送去懋功，并嘱咐“一定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徐向前忙于指挥作战，直到7月中旬，才在芦花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徐向前过去未和毛泽东见过面。在藏民区的一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红军阅兵广场举行授勋、颁奖典礼。

个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既高兴又有些拘谨。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毛泽东说：“我也是一样啊！”

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一枚红旗勋章授予徐向前，并说明这枚勋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枚勋章一直保存着。

徐向前十分激动地接过勋章。授勋仪式虽然没有在苏区那么隆重，但在长征途中授勋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屡建战功，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这些年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

这次授勋，给徐向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荣获红旗勋章的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

1931年春，国民党第26路军被蒋介石调至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一步步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国民党第26路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们感到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一致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返回北方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并派重兵堵住第26路军北上的道路，引起第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第26路军秘密工作的特别支部因势利导，加紧进行兵运活动，先后发展了参谋长赵博生等近20名党员，并争取了该部第25师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等转向革命。董振堂、季振同与赵博生

一样，虽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但有着热爱祖国、不恋高官厚禄的一腔热血，他们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

11月底，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坏，部分电文被查封。蒋介石立即向第26路军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严令查拿逮捕军中共人。这份电报落在当时主持军务的赵博生手里。赵博生与中共特别支部成员紧急商讨应急办法，一面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蒋介石；一面派人到中央苏区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准备发动起义有关事宜。中革军委批准了起义计划，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到宁都城东南的固厚圩就近联络指导，同时部署部队策应起义。

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按计划指派部队控制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和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加强城内城郊的警戒。当晚，赵博生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总指挥部开会，说明形势和第26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后，宣布起义加入红军。最终，第26路军1.7万余人携带武器2万余件参加起义。

15日，赵博生、董振堂等带领起义部队开赴中央苏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和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16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部队分别编为第13、第14、第15军。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增强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

为表彰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董振堂、赵博生，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于1932年12月4日发布通令：

“给予领导宁都起义的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给领导宁都起义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都起义的红军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宁都暴动是中华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走向革

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日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更加崩溃与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批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赵博生，1933年1月8日率部在江西南城黄狮渡钳制3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指挥作战时牺牲。为了纪念赵博生，宁都县曾被命名为博生县，瑞金建有纪念他的“博生堡”。

董振堂，率部先后参加赣州、漳州、南雄北口等战斗，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10月随部西渡黄河，指挥所部参加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县城战斗。1937年1月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壮烈牺牲。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分别建有董振堂纪念碑。

毛泽东高度评价宁都起义，1938年年底，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和他们合影，还在照片上写下：“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高度评价宁都起义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版式设计：梁晨



长征

第4820期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上，气势磅礴的战旗方队中有一面“勇猛顽强”战旗。“勇猛顽强”4个字给人以豪迈雄壮之感，其背后凝结的是革命战士与敌人在阵地上反复肉搏的壮烈记忆。

1949年，兰州战役，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攻坚战之一。

在我军解放大西北的浩荡征程中，敌人扼守兰州，关上了通往西北的大门。进门先“开锁”，城外的沈家岭被称为兰州“锁钥”，敌人在此精心布防，企图阻挡我军解放征程。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战前研究部署决定：第11师担负攻占沈家岭任务。8月24日，由于师第一梯队数次冲击均未成功，伤亡较大。师决心由第31团（现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接替师第一梯队担任主攻团。敌人就在对面，一场决战不可避免。

“勇猛顽强”战旗——以血肉之躯砸开兰州“锁钥”

■王法军 高群

沈家岭是一座葫芦形的大山岭，敌人在岭上修筑了钢筋水泥和土木混合结构的碉堡群，挖掘了三道战壕，以交通壕和环山公路互相连接。每道战壕前，都以人工削成一两丈高的峭壁。峭壁之下是一丈多宽的外壕，壕上架设鹿砦、铁丝网，埋设了地雷。整个沈家岭到处是深沟断崖，遍布明碉暗堡，敌人居高临下，构成了立体交叉火力网，易守难攻。

易守难攻也得攻！怎么攻？没有选择，只有猛攻！全团战士不顾敌人的炮火袭击，冒着雨把一道道战壕一直挖到敌前沿阵地附近。我炮兵利用夜色掩护，把10门山炮隐蔽地推进到距敌碉堡

只有300米到500米处，瞄准敌人的主要火力点。最艰苦的是突击营的战士，他们蜷缩在战壕的猫洞内已经3个昼夜，饭送不上去，就啃洋芋，喝雨水，双脚泡在泥水里，浑身都湿透了。但大家情绪高涨，战斗欲极强，只等最后一声令下。

8月25日5时55分，已经3天3夜没有好好休息的王学礼团长果断下令：进攻！战士们英勇冲锋，夺取了敌人第一道战壕。眼见失去前沿阵地，敌调主力至沈家岭正面，企图猛烈反扑，收复阵地。我官兵与敌展开反复争夺冲杀。此时，激战沈家岭就是反复争夺战壕的过程，一米一米地猛打推进，一米一米

地巩固防守阵地。

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在友邻配合下，第31团官兵先后攻占了沈家岭的核心碉堡，控制了敌人的主阵地。此时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近90%，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敌人的疯狂反扑。

一个团面临这样的伤亡该怎么办？剩下的两百多人选择严防死守。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准确射击，打得敌人一次又一次溃退下去，丢下的尸体和重伤兵，几乎盖满了山梁。战斗中，包括王学礼在内的我方多名团、营级指挥员壮烈牺牲，沈家岭终于被拿下并顽强地守住了。

战后总结时，第31团因在战斗中攻得勇猛、守得顽强，荣获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授予的“勇猛顽强”和第二兵团授予的“真正顽强”锦旗各一面。其中，“勇猛顽强”这面两米多高的锦旗，现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团长王学礼同志的遗体被安葬在兰州革命烈士公墓内，墓前竖立了纪念碑。

时光流转中，“勇猛顽强、真正顽强”的团魂在这支部队一代代官兵中传承。他们始终将“勇猛顽强”的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如同大漠胡杨、天山雪莲那样，以戈壁荒漠为伴，用忠诚和热血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